



窮理致知

略談《通鑑》所載「玄武門事變」

● 施寬文*

唐高祖武德九年（626）六月四日的「玄武門事變」，是三百年唐朝歷史中的重大事件，時為秦王的李世民以此而得為太子並即位，從而開創了大唐盛世——「貞觀之治」。貞觀十七年（643），史載其破壞自古帝王不索閱實錄之慣例，親閱事變日之記載，因見「語多微隱」遂指示云：「『周公誅管、蔡以安周，季友鳩叔牙以存魯，朕之所為，亦類是耳，史官何諱焉！』即命削去浮詞，直書其事。」¹「直書其事」恐是史家飾詞，這段實錄既因帝王指示而有所修改，以致後人多不信其為信史，歷來議論者眾，各有所說。惟歷史真相雖不易明白，卻也不容毫無根據的妄加臆測，如網文將史籍明載為李世民所招募的八百勇士，曲解為太子李建成派往宮中暗殺李世民者、云魏徵實是李世民派往東宮臥底者、云唐高祖事前已遭李世民囚禁，等等，只能是游談無根、信口開河的胡說八道。

《資治通鑑》關於玄武門事變經過之記載，自六月一日（丁巳）「太白經天」至六月七日（癸亥）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，全文共約 2872 字，其載述多取自《舊唐書》，而《舊唐書》之記載則沿用唐實錄，其內容固多偏袒李世民，但司馬光並未全然採信，因此於《考異》中多有論辨，如：「《高祖實錄》曰：『建成幼不拘細行，荒色嗜酒，好畋獵，常與博徒遊』，……又曰：『建成帷薄不修，有禽犬之行，聞於遠邇。今上以

* 施寬文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¹ [宋]司馬光編著，[元]胡三省音註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），卷 197，頁 6203。為免繁注累贅，下引原文皆以圓括號注明卷數、頁碼於內。



為恥，嘗流涕諫之，建成慚而成憾。」……《太宗實錄》曰：『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，逸遊是好，素無才略，不預經綸，……巢刺王性本凶愎，志識庸下，行同禽獸……。』」司馬光對於此類記載則以為：「按建成、元吉雖為頑愚，既為太宗所誅，史臣不無抑揚誣諱之辭。今不盡取。」（卷 190，頁 5959-5960）因此，《通鑑》所取史料雖以《舊唐書》為主，而實有所汰擇，惟所述事變之委曲，仍多舊史「史臣抑揚誣諱之辭」，茲據《通鑑》卷 191 所載略論之。

首先是極力凸顯建成、元吉之陰險凶惡。先是誣告李世民派往山東結納豪傑的張亮圖謀不軌而交付官吏審問，欲以之牽連、構陷李世民，卻因張亮無所言而未能得計。於是又在東宮宴會時於酒中置毒，李世民因此「吐血數升」，由其堂叔李神通扶還西宮。李淵見其兄弟不能相容，因此欲令李世民出居洛陽，結果因為建成、元吉數遣黨羽上密奏讒譖而事沮。此後，與太子同黨の後宮日夜譖毀李世民，李淵聽信而欲加之罪，因陳叔達勸諫而止。陷計一再未成，李元吉遂請求顯誅李世民，李淵則以李世民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狀未明，殺之無由而未答應。太子黨除掉李世民本人的陰謀未能得逞，於是轉而翦除其羽翼，首先是欲以重金收買李世民的心腹大將尉遲恭，遭拒後屢遣刺客暗殺之，因尉遲恭本是久經戰陣的猛將，刺客不敢下手，於是改在李淵面前進譖言，尉遲恭幾乎被處死，賴李世民堅求而得免；其後李世民另一勇將程知節與謀士房玄齡、杜如晦皆遭外放。此時因為突厥入寇，建成薦元吉代李世民率軍北征，元吉因請李世民手下諸勇將及精銳士卒同行；王晔密告太子黨陰謀藉機誅殺同行的李世民手下，並在昆明池為元吉餞行時謀殺李世民。事勢至此，李世民幾已無退路，於是求教於府中僚屬，又從府僚口中得知元吉「親口」道出的野心：「但除秦王，取東宮如反掌耳。」

從上述的內容中，只見李建成、李元吉除掉李世民之心極為堅定，一計不成又生一計，可謂攻勢凌厲！至於李世民面對全無手足之情、咄咄逼人的太子黨，則是極力隱忍、退讓。如府中部屬盡皆憂懼，其心腹房玄齡、杜如晦、長孫無忌、尉遲恭諸人日夜以社稷之憂，請其行周公誅管蔡之事以安國家，而李世民始終「猶豫未決」；及王晔密語太子黨謀殺之陰謀，李世民猶感歎「骨肉相殘，古今大惡」，自云雖知禍在朝夕，而欲待彼等先發，再以義討之。尉遲恭、長孫無忌對此皆反對，並激之以不能復事



而欲離府，李世民則依然猶豫難決，於是尉遲恭告以：「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，在外者今已入宮，擐甲執兵，事勢已成，大王安得已乎！」面對尉遲恭所說外兵已入宮埋伏，事情已無轉圜餘地，十六歲從軍、十八歲隨父起兵，久經戰陣，一向殺伐果決的李世民依舊不能果斷，而請人占卜，因張公謹取龜甲投地，質以：「卜以決疑；今事在不疑，尚何卜乎！卜而不吉，庸得已乎！」李世民最終才「定計」。

讀者閱讀這段歷史事件的記載，面對太子黨強勢相逼、欲殘手足的行徑，以及李世民顧慮骨肉相殘，而再三隱忍，最後無奈而被迫出手，很難不對李世民產生同情；而讓讀者「同情」並認可李世民在事變中殺害手足的「不得已」，恐怕是史官在李世民指示後撰史的用心所在。然而史文雖經苦心編織，並非了無罅隙。除了李世民「吐血數升」不無誇飾，如為事實，太子黨既欲殺之，豈能任由李神通扶還？而唐高祖向李世民所說的「首建大謀，削平海內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為嗣，汝固辭」云云，「皆汝之功」、「汝固辭」之語，史官塗飾李世民之形象，鑿痕宛然；另外，元吉親口說出的奪取東宮之位的野心之語，也難免讓人想到溫公的「史臣抑揚誣諱之辭」。而史文中最大的漏洞實在於史官所描述的李世民對於事變的再三「猶豫未決」。從尉遲恭所說的外兵入宮一事，若說「素所畜養」的八百餘勇士一開始只是為了自保，則事變前夕「擐甲執兵」的進入宮中埋伏，如此等同謀逆之事，其誰能為之？其誰敢為之！若說平素未有奪嫡事變之心，其誰能信之？！

關於戒備森嚴的宮中，效忠李世民的八百餘勇士何以能混入，陳寅恪先生在其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中已經指出：「太宗之所以得勝，建成元吉之所以致敗，俱由一得以兵據玄武門即宮城之北門，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門故也。」²其所以如此，先生據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中李義府所撰常何墓志銘，推知常何本為李建成屬下，卻因李世民利誘而投入其陣營，在事變之日常何屯守玄武門，故外兵得以進入，而李建成也因常何所部本為己方人馬而未曾懷疑。這些人事來往、布置不可能如史文所說在尉遲恭告知外兵已入宮後，李世民才倉促決定，整個過程實皆李世民平素之處心積慮。史官為了使其弑兄奪嫡具有合理性，為了讓讀者能同情其「不得已」，將八百餘外兵進入宮中埋伏如此重大之事由尉遲恭道出，仿若李世民置身事外，全不知情，反倒成了最大的

² 陳寅恪：《陳寅恪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79），頁 205。

